

女性性別意識形成歷程¹

畢恆達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

摘要

性別意識指的是對於性別的認定、對性別結構的不滿，並寄望集體行動來改善女性的社會處境。本研究訪談了共 15 位參與婦女團體、女研社或從事性別研究的女性，其年齡從 20 歲到 50 歲(訪談時的年齡)，以理解其性別意識形成的歷程。

性別意識是一個連續的過程，受訪者不必然有自覺的受到性別壓迫/歧視的主體經驗，意識也無法僅由內省就可以獲得，而論述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意識形成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儘管其間有些具有指標意義的事件發生，但是很少是為單一事件所決定。

從受訪者的敘述中，可以發覺共通的二個相互關連的價值觀在女性身上作用，一個是男強女弱，一個是男主外女主內/賢妻良母的價值觀。要從社會性別歧視的框框中跳脫，往往需要女性主義論述的中介。有的人是意外遇見，有的人是刻意尋找。沒有論述之前，女性經常把自身的不悅經驗歸咎於個人能力或是普遍人性的問題；接觸論述之後，則可以把以前說不清楚的都說清楚了，更進一步會看到以前看不見的性別經驗，甚至在具體實踐中帶來力量。在這過程中，受訪者提到發現女人其實是很有力量的，可以打破男強女弱的迷思。而生命經驗的斷裂與破滅(如先生外遇，自己卻得不到社會支持)，則會打破賢妻良母的迷思。

有了性別意識之後，一方面帶來力量，讓自己更敢於表達意見、從新認識自己/做自己；一方面也面臨很大的壓力與掙扎，例如回家該不該洗碗？該不該糾正朋友具有性別歧視的話語或行動？許多受訪者表示最難改變的是家人，於是採取由遠而近的策略，在不危及關係的情形下，盡可能去介入/改變性別歧視的事物。

¹ 本研究曾獲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 (NSC87-2413-H002-003)，初稿曾在 2003 年 9 月 27 日的「意識·認同·實踐：2003 年女性主義學術研討會」上發表。作者非常感激所有受訪者願意與我分享其生命經驗、研究助理簡淑媛與楊長苓協助訪談與討論，也謝謝「通識教育季刊」二位匿名審查者的寶貴意見與建議。



一、前言

台灣的婦女運動這二十餘年來日益蓬勃，教育體制內近來大力推行性別平等教育、媒體也經常有關於性別的討論，此外也定期有女性影展、女作家書展、媽媽讀書會的舉辦，其實已經提供了許多接觸性別論述的機會。不過即使如此，仍然有許多人面對迎面而來的性別論述卻視而不見，或者刻意迴避，甚至將之視為異端，不願與之對話。儘管性別論述的接觸可能是偶然的，但是願意傾聽甚至持續參與討論，通常還需要有足夠強度的動機。本研究就是企圖透過對於關心性別議題的女性的深入訪談，去探求其性別意識形成的背景以及接觸並持續參與性別論述或行動的原因與動力，以及有了意識之後會造成何種改變。

二、文獻回顧

Gurin 與 Townsend (1986)認為「認同」(identity)意指一個人意識到自己為團體的成員，對於身為成員具有感情連結；而「意識」(consciousness)指的是成員對於所屬群體在社會上之位置所具有的意識形態。群體意識的內涵包括對於全體相對擁有權力、物質資源與優勢位置的集體不滿；對於群體在一個階層化社會中擁有特權或權力受剝奪的合法性提出評估；相信集體行動為實現群體利益之所需。同樣地，Wilcox (1997)認為性別意識指的是對於性別的認定(identification)、對權力的不滿、對體制的譴責與集體行動的認識；性別意識並不必然指涉某一種特定意識形態(ideology)，如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或分離主義女性主義。

Gerson 與 Peiss (1985)又進一步指出性別意識並非有或無(either you have it or you do not)的問題，我們應該將性別意識視為一個連續體。依在此連續體上的不同位置，可將性別意識分為三種型態，分別是性別覺察(gender awareness)、女性/男性意識(female/male consciousness)與女性主義/反女性主義意識(feminist/anti-feminist consciousness)，而性別覺察為接下來二種意識發展所必須。性別覺察牽涉了對於既有性別關係系統不具批判性的描述，人們接受了現存社會對於性別的界定，認為它是本然(natural)而無法避免的。將對於現狀的不滿個人

化，認為是個人的問題。例如一個女人無法獲得某項工作，她會認為是個人能力不足，而不是雇用過程中性別歧視的結果。對於性別安排會有小的不滿，但是還不致於質疑性別系統。女性/男性意識建立在性別覺察的基礎上，從性別覺察階段對於男女對應特質的表面描述，至此認識到了其中男女相互的權利與責任關係。而女性主義/反女性主義意識則是一種意識形態，對於性別關係系統採取非常清晰的挑戰或防衛，同時共享群體認同，並逐漸政治化而導致社會運動的產生。

Gurin 與 Townsend (1986) 以及 Wilcox (1997) 對於性別意識的界定都同時涵蓋了對於群體社會位置之理解、對權力關係的批判以及採取集體行動之必要。這種觀點與 Gerson 與 Peiss (1985) 的女性主義意識比較吻合，只是作者都同意性別意識並不對應到某一個特定的性別意識型態或女性主義，例如自由主義、社會主義或激進女性主義。因此，就本研究的界定而言，只要是理解到女人並非天生而是社會所建構、檢視女人作為集體所處的社會結構、相信應該採取集體行動來改變女性集體處境，就算是有了性別意識。

Downing 與 Roush (1985) 提出女性主義認同(feminist identity)發展的階段論。第一階段是被動接受(passive acceptance)。女人或者是沒有覺察或者是拒絕承認個人、機構與文化性別偏見，以及其所受到的歧視。亦即接受傳統的性別刻板角色，小心避免因做為女人而感到沮喪。第二階段是揭露期(revelation)。經由一個或一連串發生的矛盾或危機，女性終於不能再加以忽視。這些事件包括參加意識成長團體、離婚或申請信用卡遭拒等。雖然有的人是在一夕間過渡到此階段，但是大多數人都要經歷過一連串的事件。此後，女性對於性別現象採取了不同的參考架構來詮釋。第三階段是嵌入/發散期(embeddedness-emanation)。大多數女人經歷參與婚姻、工作、養育小孩等主流性別文化，因此很難退一步去發現「女人是美麗的」次文化。這個過程是痛苦的，因為沒有任何一個受壓迫群體會和壓迫群體有如此親密的關係。當女人有了嵌入的經驗，會發展出和其他相似女人的親密感情連結，反思自己的性別詮釋參考架構、有機會在一個支持環境中發洩憤怒、並發展新認同的強度。漸漸地，女人就可以進入此階段後面的發散期。女人會採取比較開放的觀點，以取代過去狹隘的二元論。第四階段是整合期(synthesis)。重視做為女人的正面價值，發展正向而實際的自我概念。超脫傳統的性別角色，根據個人價值來做決策，經由個別而非刻板的基礎來評斷男人。第五階段是積極投入期(active

commitment)。將新建立的性別認同轉化成爲有意義且有效的行動。在個人得到滿足的同時，投入社會改革的行列，爲女人建構一個更爲美好的未來。作者也同時指出這五個階段並非一個單向的發展階段，女人會在這些階段中循環。當經驗到比此階段更爲深刻的挑戰時，會運用前一階段習得的能力來克服。女人也可能在某一個階段停滯，特別是揭露與嵌入的階段。當女人缺乏應付當前生活壓力的能力時，也可能退回到前面的階段。而階段的進展不只決定於女人的準備程度，也受到特定人際與環境脈絡的影響。Hyde (2002)則根據經驗研究，建議將此模式中的五個階段視爲五種面向(dimension)而不是階段。她不斷提醒婦女研究的教師以及諮商治療師不要斷定後面的階段會比前面的階段進步或比較好。她指出許多女人即使已經到了積極投入的階段後，仍然不時經驗到對於重新喚起性別歧視的憤怒，而有些人可能沒有經過整合的階段就已經從揭露期進入積極投入期。

Stanley 與 Wise (1993)指出傳統有關性別意識成長團體的相關研究，意涵了一個三階段的意識發展模型。亦即從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意識喚醒(consciousness-raising)，進展到女性主義意識(feminist consciousness)。這種發展模式強調時間的序列發展，預設了階段有高低之分(從低到高、從看不見進展至看到真實)，而階段發展似乎有終點，然後就停止了。Stanley 與 Wise 認爲女性主義意識不是意識改變的終點，女性主義意識也不是只有一種。傳統的階段論過於乾淨，無法描述真實複雜的意識發展過程。她們認爲意識是一個循環或螺旋的過程，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就只是一個永無休止的流動。Griffin (1989)對於性別意識的看法和 Stanley 與 Wise 一致，認爲性別意識不是線性過程，而是循環或螺旋進展的。女性主義不是只有一種定義，而是有很多種女性主義，其概念的發展則是一個不斷協商的過程。

西方既有的性別意識的研究集中在女性經驗，台灣的學術界也是如此，包括吳書昀(2002)、朱嘉琦(1996)以及高歆怡(2002)分別以婦運參與者女性主義者、女性成長社團學員的生命故事來探討女性意識發展歷程；施悅欣(1998)以大專通識教育性別相關課程爲研究對象，檢視此類課程對於開課教師與學生性別意識的影響；林昱貞(2001)、鄭瀨姣(2000)與陳凱筑(2003)則以教室觀察與深度訪談的方法，分別研究國中與國小女性教師性別意識發展的歷程，以及在教學現場的實踐。上述論文其中有關性別意識形成歷程的部分，林昱貞(2001)發現，促成意識覺醒的因子有

主體受歧視的經驗、高度的自省能力、論述或成長團體的啓蒙、以及實踐省思的觸發。然而性別意識的發展基礎又並不必然侷限於性別的受壓迫經驗，而性別意識爲一辯證發展的動態過程。吳書勻(2002)與朱嘉琦(1996)的討論架構非常相似，分別討論受訪者性別意識發展的因子、內涵，以及與個人主體間的關係。總結而言，影響性別意識的因子有原生家庭背景、性別歧視的主體經驗、論述的啓發、女性典範等；意識的內涵則是對於女性以及其他弱勢團體處境的體認與省思；而性別意識通常造成個人更爲深層的自我認知、定位、與改變。鄭瀨姣(2000)同樣認爲原生家庭以及婚姻生活中性別不公平的經驗，加上反思的學習情境，促成個人性別觀點的轉化。而性別意識的發展，有助於性別議題的思考與自我概念的正向發展。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目的是在於理解女性性別意識形成的過程及其脈絡條件，以及性別意識與日常生活實踐的複雜關係，所以採用深入訪談研究法，訪談具有性別意識的女性。本研究於民國 86 年間共訪談 15 位或參與婦女團體、女研社或從事性別研究/實務工作的女性，其年齡從 20 歲到 50 歲(訪談時的年齡)，以理解其性別意識形成的歷程。訪談內容包括下列各項：1. 家庭背景：家庭組成、性別組成、教育方式、家務分工、父母對兒女的期望。2. 教育背景：就讀學校(男女合/分校，班)、男女同學互動、是否獲得性別相關知識。3. 性別意識形成過程。4. 身體語言、穿著、行爲舉止。5. 日常行動、外出、過夜之情形；交通工具、居住空間。6. 對社會性別事件與議題之看法和參與情形。7. 是否有遭受性騷擾、性侵害之經驗，以及其對策與態度。8. 工作中之性別關係。9. 愛情與婚姻關係。10. 性別意識對日常生活之影響：人際互動、別人對你的看法、工作與應對策略等。平均每次訪談時間大約 2.5 小時，訪談當時皆有錄音，並轉謄成文字稿以進行資料分析。

四、研究發現

根據受訪資料，正如 Stanley 與 Wise (1993)、Griffin (1989)等人所言，性別意識發展過程，並非是一個線性的、有預設終點的、由低往高的階段發展歷程，它沒有明確的起點，是一個永無休止的流動。性別意識發展是一個緩慢、持續進行的

過程，很少受訪者是在一夜間突然開竅，從此看透性別現象，開啓新的人生。過程當中，當然會有一些具有指標意義的性別事件發生，但是意識的發展是漸進、來來回回的過程。有了意識之後，有獲得、有挫折，有啓發、也有疑惑。以下就性別意識發展的幾個重要面向加以討論。

一、成長過程中的性別經驗

吳書昀(2002)、朱嘉琦(1996)都提到原生家庭背景是性別意識發展的因子，林昱貞(2001)發現主體受性別歧視經驗是意識覺醒的因子，然而她們和陳凱筑(2003)等人也都強調，性別意識構成並不侷限在個人受歧視經驗。固然性別意識形成並不必然基於一個自覺的性別壓迫成長歷程，不過根據受訪者的陳述，性別歧視的經驗仍然是其與女性主義對話、讓性別意識持續發展很重要的動力來源。根據本研究受訪者自陳的性別成長經驗，大致上可以分成三類。第一類是生為錯誤的性別；第二類是有自覺的性別不公經驗；第三類是不認為成長過程中有性別問題。茲更進一步說明如下。

第一類是生錯性別：亦即女性的性別不受到期待。社會價值觀甚至認為沒有生兒子是父母上輩子做了甚麼不對的事情而遭受上天懲罰，在女兒出生那一刻，彷彿已經是一個世界的崩解。受訪者 I(四年前段班)表示，媽媽懷她的時候，算命的說，這一胎是男的，而且會帶給她家名利，讓家人無憂無慮。她的祖母就一心期待男孩子。結果她媽媽生下了她，祖母對她媽媽的態度就一百八十度轉變。她一直很為媽媽感到委屈。H(四年後段班)從小就「常常看到父親因為沒有兒子而被人家取笑」，所以她就一直很努力讀書做事，希望「不要輸給男孩子」，希望「父母親不要因為沒有兒子而傷心」，因此加倍努力來證明，即使沒有兒子，日子一樣可以過。「生女兒是一種懲罰」是這二位民國四十年代出生的受訪者共同面對的社會價值，社會雖然在變，這種價值並未完全消失。十年前，國小男生(七年級前段班)的作文還是寫道：「假使我三生不幸，而成了女生」、「人生都有個輪迴，是看你前生所種的因果，假如我是女生，我認為可能是前生造的孽，真是三生不幸。」(註 1)生為女生，嚴重者讓家族，尤其是母親蒙羞，必須承受他人的指責；有的則在成長過程中可以感受得到自己性別的錯置。有些父母愛女親切，對之投注很大的期望，也許不自覺對女兒說：「我從小就把妳當作男孩子養」，但是這

種話語仍然傳達了男尊女卑的社會性別價值。意識到自己的性別並非社會所期待的成長經歷，會讓女性從小對於性別較為敏感。

第二類是在成長過程當中很明顯的自覺到性別不公平的經驗。很有趣的，她們經常從吃飯談起。M 說：「我們家兩個弟弟嘛，所以男生就理所當然就兩隻雞腿就給他們吃，那我們就吃雞翅」。連出去外食，她父母都只給她五十元，而她弟弟卻可以拿到七十或一百元。C 表示：「譬如說我們巷口演歌仔戲，阿公每次去就會買零食，例如燒蕃薯什麼的，那個一定是只有我弟才有分，我們其他女孩子只能乖乖的坐在旁邊」。過年的時候，明明是女人辛苦做飯，卻是男人(爸爸、伯叔等)先上桌，女人留到後面跟小孩一桌。有一天她發現他的弟弟居然與爸爸同桌，可是大她六歲的姊姊卻要跟小孩同桌。A 的家庭以爸爸為主，她抱怨從小「吃螃蟹我爸爸永遠是吃中間的部分，我們小孩子跟在旁邊是吃那些腳...所以在我們印象裡面，父親是為主的，女性是去配合的」。當然吃飯並非唯一不公的經驗，對照的往往是，吃不到好東西，卻要承擔相對比男生更大的責任與義務。C 就說，燒蕃薯只有弟弟有分，可是「如果家裡有什麼事的話，一定是我們女生要去做」。如果弟弟哭了，阿公就會找她麻煩，認為一定是姊姊的錯。M 的弟弟可以吆喝姊姊，說她們是「查某乾」(婢女)，她爸爸居然還很得意，認為兒子有男子氣概。M 說：「父母也會要求我們掃地、拖地、晾衣服。這些瑣碎的家務都是我們女生在做，然後男生...坐著看電視，女孩都必須要在廚房幫忙」。家務分工不均確實是許多受訪者經常感受到的性別不公平的現象，F 也回憶道：「[媽媽]都會叫我晾衣服...要去買醬油的時候，就會叫我去買！那時候心裡就會模模糊糊的想說，她為什麼不叫我哥去買」？她記得有一次正在看卡通，就回她媽說：「妳為什麼每次都叫我去買？不叫哥去買」？她媽媽回說：「話不是這樣講，像每次要搬電視或是釘釘子，還不是叫妳哥做？而沒有叫妳們去做」！她又回她媽一句：「可是電視又不是每頓飯都要搬？可是買醬油那些事情都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然後她媽媽就不理她了。所以家事分工的男女差異，讓受訪者容易看到男生與女生工作負擔的差異，也看見父母的偏心。值得一提的是，在家中往往是由媽媽負責家務勞動，因此媽媽也往往成為父權的行使者。

儘管我們社會中存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價值觀點，就接受高等教育而言，有些受訪者仍然經歷了父母對於兒女不同的期待與支助。F 從小成績就很

好，不用家人操心，可是父親寄望兒子讀博士，卻不斷說服她師範學院有多好。F 不喜歡教書工作的刻板無趣，心中的理想是念法律系。父母當然很不贊成，告訴她「就算妳不念師院，也念那種商的，或是外文，這樣還可以教英文」。還好那時候陳水扁已經很出名，F 就用阿扁的故事去說服父母。他們勉強答應了，可是還是勸告她：「最好不要去考律師，要去考法官，因為法官還比較像公務員，那也不錯」！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父母對於女兒理想的堅持，也許有些退讓，但是對於女人未來的想像仍然侷限在教師、公務員這樣的框限當中。M 很想讀廣電系，但是只有私立大學的選擇，父母說經濟上負擔不起，就還是要她選擇國立大學的科系。可是她的小弟考上逢甲，她「爸媽也沒有吭一聲啊」。她生氣的是，她當初放棄理想為的就是父母「負擔不起」這句話，可是「事實上證明這句話根本不是真的，祇是為了女孩子要省錢」。這些不公的察覺建立在比較自身與異性（兄弟、父親）家務勞動、求學等經驗差異的基礎上，看到的是不公平、偏心，可是還不懂得背後形構的性別因素。

第三類是生活在一個自由開放的家庭環境中，讀書升學過程順利，家事負擔沒有明顯性別差異，就沒有察覺在性別經驗上有甚麼不公平之處。受訪者 B 的父母於民國三十八年從中國大陸來台，身邊沒有親戚朋友，相對獨立，沒有長輩告訴他們應該做甚麼，所以 B 自己認為「我從小的環境還蠻自由的，就在家裡面好像隨便什麼事都可以做，也不會想到要做太離譜的事」。再加上上面有三個姊姊已經在家衝撞出更大的活動空間，所以發展比較沒有受到限制。她自認為從小聰明，從來不會用性別來歸類。E 也覺得小時候表現很優秀，沒有察覺有性別的問題。其中有些受訪者是在較大之後，才察覺家中的性別差異。例如 K 原來只有人的概念，不覺得有性別問題，因為父母也希望她讀大學，所以以為家中應該沒有重男輕女的觀念。她談到，有一次「我爸就跟我弟說，如果他考上前十名，就讓他買一輛摩托車。可是在那之前，我妹有跟我爸要求過她想要買一台摩托車，我爸就跟我妹說，等到妳大四再騎吧」！她跟她妹妹就很質疑爸爸到底是用怎樣的標準來決定是否買車。等到弟弟買車之後，她爸爸才來問她們是不是也要買，她才發覺原來她們的需要只是「附帶」的；原來儘管升學順利，但是男生女生的待遇還是有所差別。G 則是在父親為哥哥與弟弟買房子，而她們姊妹卻沒有的時候，才警覺原來男女有別。但是她也不好抱怨，怕傷了家人的和氣。



受訪者中有從小有自覺受性別歧視經驗，也有人沒有察覺在性別上有甚麼問題，並不表示主體受歧視經驗就無關緊要，只是上述二種人可能在性別意識發展中走了不同的路徑。有受壓迫經驗的受訪者，會有高度的興趣或動機去接觸女性主義論述，論述很容易引起共鳴，因為切身，因為為自己的親身性別經驗找到了解釋，以及改變的力量。然而在一個自由開放家庭中長大的受訪者，則可能去接觸一些非主流的論述，例如左派思想、環保論述，包括女性主義。即使成長中沒有自覺受到歧視，但是有可能看到身邊的女性親友處在性別不公的環境。而且在一個性別歧視的社會中，任何人無法侷限在原生家庭中生活，她總要走進校園、進入婚姻、工作、踏入社會，因此也必然會遇見性別歧視的經驗。走出家庭，在公共空間中最共通的性別經驗就是性騷擾。

上述這些並不認為成長過程中因為性別而受到不公平對待的受訪者，還是有些性別方面不愉悅的經驗。其實女性無論在一個如何公平安全的家庭與學校環境裡成長，進入公共空間中，免不了有遭遇性騷擾的風險。對女人而言，性騷擾是一個跨越階級、種族、性取向的共通經驗，也往往因為性騷擾而讓自己意識到自己是女人。E 在就讀國中高中的時候要擠公車上學，她說「我就被摸好幾次，可是我那時候都很害怕，都不敢怎樣。然後也一直在懷疑，是不是自己太敏感？自己搞錯了？...我就在想說那是不是我的問題？為什麼他們都是找我，而不找別人？對，那一陣子很痛苦可是都不敢跟別人說，連家人也沒說。都沒有說，就是把它忘記了」。B 表示就讀大學時，站在辦公室門口，一個過路的男子對著她吹口哨，「那個時候我才發現，我是一個會被人家吹口哨的人，我是一個女的」。性騷擾的經驗讓女人意識到生理的女人同時也是社會的女人。

在閱讀與分析這些受訪者的性別成長經驗時，我意外地發現，不管她們是有強烈的性別不公平的自覺，抑或不覺得性別有甚麼問題，由於在類似的性別歧視社會中生長，竟又刻畫著非常相似的性別痕跡：那就是從外在而言，她們接受了培養賢妻良母的管教與馴化；就內在而言，是一種內化的男強女弱的價值觀，她們對於女人（自己）沒有信心，進而崇拜男性。在這裡我使用「賢妻良母」作為概念的總稱，根據受訪者所陳述，其中包含了婚姻、做家事、賢淑、打扮、乖、不要太有主見、不要出風頭、不要太強悍等詞語。而「男強女弱」則涵蓋了女人是弱者、沒有自信、模仿男性、欣賞男性、崇拜男性等描述。

1. 賢妻良母的意識形態教化

許多受訪者表示她們在家庭、在學校中不斷獲得一個一致的訊息，就是「女人最好的歸宿是婚姻」。所以父母或老師對她們的要求，不管是應該做甚麼，或者是不能做甚麼，某種程度都是在為訓練她們成爲一個賢妻良母而準備。受訪者 A（三年中班）描述，在她家中一切以父親爲主，女性只是扮演配合的角色。學校校長（女子高中）也是接受日本教育的，所以無論學校或家庭，接收到的訊息都是「女孩子要賢淑，要會做家事就夠了，書唸得好不好沒有什麼關係...女人最好的歸宿就是結婚嘛，嫁一個好的先生」。所以她「從小就是準備唸完書以後結婚，當賢妻良母...感覺性別就是這樣」。受訪者 C 小了 A 大約 25 歲，同樣是就讀女校，但是經驗卻如此類似。她說校方關心的不是女生在中學就學期間應該要具備何種能力，該有怎樣的發展，「她們要的只是一群很乖的女生，而不是一群有想法的女生。」年紀位於 A 與 C 中間的 M（五年中班）也表示她國中開始自己洗衣服，可是她弟弟卻不必。她說：「家裡有洗衣機，但是媽媽把我的衣服挑出來，說要我洗衣服是一種訓練。訓練將來成爲家庭主婦，以免嫁出去丟人現眼，說我們沒有家教」。

一位三十歲左右的女性朋友也提到，從小父母鼓勵她們用功讀書，栽培她們不遺餘力，而她自己也在課業上表現優異。然而當她到了適婚年齡仍然在攻讀博士學位時，父母卻爲她的婚姻而擔心，甚至責怪她就是書讀得太多，所以還嫁不出去。讀書本來是一件父母稱許的事情，沒想到一旦「妨害」到婚姻，書讀得好也變成女人的一項負的資產。這也表示對女人而言，「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念，畢竟還是比不過「賢妻良母」的重要性。

這種對於女人成爲賢妻良母的教化，不一定來自於年齡、社會位階較高的父母或師長，男朋友也是父權意識形態的行使者。L 的男朋友不喜歡她打扮得太邋邋，打扮的整整齊齊是他最起碼的要求，可是對 L 來說，「這是蠻高的要求，因為我喜歡隨性的樣子」。O 的男朋友也常常批評她穿衣服很沒有品味，有一天她打開衣櫃，驚然發覺裡面的衣服幾乎都不是自己選擇的，其實只是反映男朋友的品味。J 說她讀小學時候，同學很喜歡說歇後語，例如「廁所裡撐竿跳」（過糞/過份），但是因爲她媽媽覺得這種話很不雅，所以她在高中以前從來沒有說過半句髒話。

她媽媽會藉由讚美和批評來訓練她該如何穿著打扮、如何表現笑容可掬的樣子。不斷告誡她：「坐要有坐相」、「妳不要表現那麼強悍，妳不要那麼出風頭，不然妳會沒有男朋友」！也就是告訴她女人應該有的價值觀，以及如何去吸引男人。在這種賢妻良母觀念的教化馴訓之下，又還沒有接觸女性主義，她自然也內化了這些價值觀點。

2. 從賢妻良母的教化到男強女弱的價值

受訪者 C 又提到，中國發生天安門事件的時候，男校的學生去靜坐抗議，女中的老師卻叫她們「不要去淌渾水」。在這樣的成長環境下，她對自己缺乏自信，雖然功課好，卻不敢報考理組。然後發現社團、班上、打工場所，怎麼男生懂得那麼多、那麼厲害？甚至「有一點到了崇拜的地步！」賢妻良母的教化，同時導致男強女弱價值的內化。

J 說她以前是一個文藝少女的樣子，「每天寫些東西、很溫和、願意傾聽、不會拒絕別人、非常有耐心」，雖說不是自願的，但是覺得必須藉由那樣的形象讓男人來肯定自己存在的價值。因此以前她很容易就對男生流露出崇拜的眼神：「喔！你好厲害」！K 也說社團的男生會對學弟說，不要叫他學長，就直接叫名字就可以；可是他們不會對女生這麼說，他們很喜歡聽學妹對他說：「XX 學長，請問...」。在閱讀資料過程當中，沒想到「崇拜」這個詞語，竟不斷重複出現在不同受訪者的口中。I 表示在高中時看到的男女關係上，男生是處於一個偶像的立場，「男生只要在球場上，女生一向是個崇拜者」。K 在高中的時候很討厭女生，「覺得自己那時不屑與女生為伍，因為我欣賞男性的特質...覺得男生比較不會斤斤計較，比較幽默啦之類的」。所以她就以男生為模仿的對象，等到接觸女性主義之後，才理解模仿永遠不可能勝過正本。她接著說，「我想如果以前有一個條件跟我差不多的男生...我都覺得自己比他們矮一截」。L 在談戀愛的時候，男朋友總是「在扮演知道所有事情的角色」，而她卻「扮演很多事情我是不知道的角色」，然而「實際上我們知道或不知道的比例應該是差不多的，也許只是領域的差別而已，不過，我就是覺得他知道的比我多，他比我好那樣子」。

上述所謂外在的賢妻良母意識形態的教化以及內在的男強女弱的價值觀，不只影響女性個別的態度與行為，而且成為女性集體的行動。受訪者 L 在就讀高中的時

候，發現沒有辦法不去想女性的外表，沒有辦法不去配合主流社會對於女性外表的要求。她描述高三同學集體減肥的恐怖情境：「常常有很多同學整天什麼都沒有吃，包括我，而且是連續很多天；有時候早上很餓，就吃了早餐，可是會在升旗之前，跑到廁所去吐掉。...現在想起來，當然會覺得很荒謬，可是那時候會覺得那很正當，甚至是同學間彼此競爭性地在做這些東西」。J 轉述她一位女性朋友的經驗。由於她有暴牙，母親嫌她長得醜，她因此存了三年錢進行牙齒矯正。雖然還有沒有男朋友，但是有很多要好的女性朋友，然而她「每次講話都低下頭，不敢讓人家看到；她不太跟人家講話，也不想讓人家看到她的臉」。J 細問之下，朋友坦承她非常需要一個男生說她很好看，這比一大群女生說話都還有力。她的經驗顯示，女性的容貌整飾上受到極大的社會壓力，而信心的來源卻需要男性的肯定。

女性這些取悅男性或崇拜男性的行爲，當然也與物質權力系統的性別不均有關。從 K 關於買機車、M 的便當錢，與 G 關於買房子的敘述中，可以知道物質分配中明顯的性別差異。J 說以前「交男朋友好像就是為了摩托車...所以會選擇車子比較好一點的男生」。可是當男朋友騎機車爲她接送時，她就必須有相同的回報：「在旅行過程中，我必須很努力的諂媚、示好」。所以有了自己的機車之後，她不但有了行動自由，也不用再因此去討好男人。

二、論述與團體

性別意識很難僅經由對於受性別壓迫經驗的內省就能夠獲得，人們也許可以感受到不公平，但是通常感到理所當然或者無奈，無法察覺女性在社會中的共同集體命運。有的人會歸因於個人遭遇的不幸罷了，有的人則認爲只有普遍的人性問題沒有性別問題。透過論述可以把以前說不清楚的性別經驗說清楚，也可能進一步看到以前所沒有看見的經驗。

E 在大一的時候認真地讀了「西蒙波娃回憶錄」，發現即使在西方社會中的女性，也與她有同樣的問題，以及成長過程中許多內心的掙扎、孤寂與無力感，就很受感動。過去她把這些經驗矮化成爲個人的問題，讀了書才感受到女性集體的處境以及背後的性別結構作用。K 則是讀了施寄青的「走過婚姻」後，驚訝發現原來一個高學歷女性的命運也會是如此，因此第一次有那種「自己是女人」的

激動。否則她過去都只有「人」的概念，而不會去想性別的問題。不過這種感覺也只存在於一剎那間，因為她覺得自己應該不會那麼倒楣吧，但其實也已經悄悄播下性別意識的種子。閱讀清華大學出版的「校園反性騷擾行動手冊」（簡稱：小紅帽手冊）再度讓她看見並親身體驗女性主義的力量。

K 在國中的時候在公車上被陌生男人摸了一把，一整個月心中都還非常害怕。高中的時候姊姊的男朋友在清大就讀，送她一本小紅帽手冊。她把這本書讀得滾瓜爛熟，書上說對於性騷擾的害怕與不知如何反擊，是因為平時缺乏想像與練習，所以她就一直想、想、想，甚至期待哪一天能夠再遇見性騷擾。後來在公車上果真又遇上了。她說：「感覺有人在摸我的大腿，我非常地生氣」，她也還記得書上說不要懷疑這是不是真的，於是就「回頭狠狠地揍了他一拳」。然後「破口大罵，要引起全車的注意」，結果全車的人都在看她罵那個人，「那個色狼就跟我道歉...我說這種事情是沒有什麼好道歉的」，然後她叫司機停車把這個色狼趕下車，而且他下車的時候還記得叫他把車錢拿出來。於是她受到全車乘客英雄式的歡迎。她那個時候就「突然有一種感覺，覺得這個就叫做女性主義」。發現女性主義「可以保護自己的身體，發現自己其實是很有力量的」。

L 在大二的時候爲了湊學分，被同學拉去修「女性主義思潮」的課程。當時她完全沒有性別意識，講義是英文的，看了也不懂，上課也不太認真。她當時覺得自己從小過得頗爲順利，也沒有想過要變成男生，所以很難想像性別的問題。期末報告也沒有讀書，就隨便寫了一個自我反省的小報告交差了事。下學期還在猶豫要不要繼續聽這位老師的課程，結果有一次老師對某個學生質疑說：「妳為什麼要孝順公婆」？讓她覺得很奇怪。她過去就「理所當然地預設自己以後會去孝順公婆」，沒有認真想過這個問題，當有人說不可以這樣的時候，就「有點被嚇到了」。當時她也覺得有點「被罵到」的感覺，反而對課程有點抗拒，聽聽就跑掉不去上課了。雖然沒有繼續上課，女性主義的東西其實已經慢慢在沈澱發酵了。而且逃離之後，當別人不再指責的時候，她反而「開始去想為什麼這樣、為什麼那樣？」每天睡覺前，也讀西蒙波娃的「第二性」，雖然看得懵懵懂懂的。然後大三修研究方法的課程，和幾位同學一組進行期末報告研究，「大家比較想作切身的、身旁的、自己真的關心的事情，所以就作戀人關係的互動」。研究過程中，不只看到了異性戀/同性戀，還看見非傳統一對一的戀人關係，也看見婚前

性行爲。對她而言，不只是開了一扇窗，「簡直是看到另外一個世界」。她於是想：「為什麼我不是這樣？為什麼她們是這樣？那這樣到底是好或不好？那我自己到底想怎麼樣？」之類的問題。然後開始分析並調整她與男朋友的關係。F 同樣地修了女性主義思潮的課程，「忽然覺得以前自己的很多感覺，都找到答案」，例如「為甚麼我對於我父母對我和我哥哥的期待不一樣，有那麼大的不舒服感覺？」、「原來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我才養成這樣的個性」。

受訪者較少是一個人與論述進行私密接觸，大多數是在一個集體的場合中與論述遭逢，例如上課、讀書小組、女研社、婦女團體。集體參與論述的特質在於，更有持續的動力、建立姊妹情誼、親身看到女人不同的典範。J 說加入女研社之後，把以前說不清楚的東西都說清楚了，而且說理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肯定。前面她曾提及國中時遭到性騷擾的經驗，覺得很痛苦，晚上還因此做惡夢。和媽媽訴說，她媽媽的態度卻是：「每個女人都會遇到這種事，所以不要難過」，讓她失望又生氣。和同學談到性騷擾這個話題，又總是幾個女生哭成一團，充滿了無力感。加入女研社之後，「大家這樣一起講，就會更強烈，而且對於一些相關的東西，也會比較熱心去參與，然後書籍也會去閱讀」。以前和同學聊性騷擾只是相互療傷，可是在女研社討論性騷擾，除了經驗分享之外，還會加入很多女性主義的概念，會討論是怎樣的性別結構造成性騷擾現象，又有哪些可以採取的反擊策略。她的經驗同時點出了論述以及集體經驗的重要性。如果沒有論述，集體分享可能變成大家哭成一團，相互療傷；如果沒有集體經驗，參與論述的熱情不會強烈、比較不容易持續。

受訪者 I 提及一個很有趣的女性集體經驗。一群中老年女人聽課，有人講到某種老男人是巨大垃圾，因為「他老了之後，無所貢獻，而且放在家裡，也沒有什麼可以提供的，他連家事都不會做；他就杵在那裡，等妳煮好弄給他吃。他不能提供妳什麼也罷了！他等於是一個巨大垃圾」。起初大家還聽不太懂，男人怎麼會是垃圾呢？I 說：「等到想通了之後，大家都哄堂大笑。」我可以想像這群女人意會過來之後，大家笑得東倒西歪的模樣。如果社會的價值觀不斷灌輸女人「男強女弱」、「女人是弱者」等觀念，突然間男人成爲無用的垃圾，這是多麼大的諷刺與顛覆。F 在大學參加的社團裡有很多男性殺豬，於是她成立性別研究小組，研讀女性主義書籍，一方面「從討論裡面學到很多東西」，另一方面還可以「順

便教訓一下我們社團的男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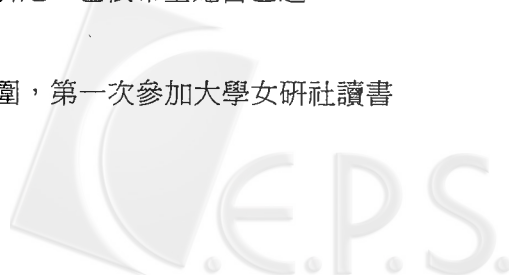
不過也有受訪者提及參加這種女性團體經驗的挫敗。如果參加討論的成員，其生活經驗或是女性主義知識差距過大時，也可能帶來負面的後果。E 引述有一次女性讀書小組討論失眠的問題，很多人表示晚上睡不著，大家就建議各種克服失眠的方法。這個時候，有位成員就言簡意賅的說：「很簡單，就自慰啊！達到高潮就可以睡著了」。這種說法，把她的朋友嚇著了，就再也不敢參加這個讀書會了。E 也提到參加女性意識成長團體，爲了要營造氣氛，要建立姊妹情誼，大家就必須要「交心」，可是她覺得都還不認識其他成員，就要講一些非常個人私密的事情，「很恐怖」，就不太敢再參加了。

三、女性典範

論述固然可以讓人看清楚過去所說不清楚的性別經驗，對有些人而言，畢竟仍有距離。而參加女性團體的經驗，除了上述所言可以補給動力、建立姊妹情誼之外，最重要的是可以親身遇見女性的典範，而典範的意義在於帶給自己「可能性」。論述不再只是紙上說說，它就具體在眼前展現，讓人有「大丈夫[女子]當如是也」的希望。女性的典範總括而言有三種，對比於前節討論的外在賢妻良母角色的教養與內在崇拜男性的意識形態，正好一種是能夠跳脫傳統桎梏的女人（非傳統賢妻良母）、一種是非常有知識與能力的女人（女人非弱者），而第三種則是愛女人的女人（非異性戀）。

I 參加一個性別課程，她很佩服眼前的女老師爲甚麼可以把事情表達得如此清楚，一下子就抓到重點，「聽到的東西就像是把我心裡所想的東西都掏出來講一樣，只是我沒有辦法那樣表達」。老師鼓勵她們不能靜默、要動，她們的情緒也就跟著高漲起來。J 從女研社學姊以及女性主義教授身上，看到「聰明、溫和、寬容、有誠意、而且非常善良」的特質，給她一種很美的感覺。她強調這種特質是在所謂「模特兒」典範裡完全看不到的。從她的對比中，我們可以看到，「美」的定義已經跳脫父權對於女人身體的美的界定，而轉變成爲一種人格特質：「既聰明、又善良」。她覺得這種特質很棒，非常吸引她，也很希望她自己過一、二年之後，能夠長得跟這些人一樣。

K 在讀高中以前，沒有踏出過台北車站的範圍，第一次參加大學女研社讀書



小組的活動，晚上就跟大家去酒吧玩。她描述：「就看到很多學姊開始抽煙喝酒，我覺得很震撼，跟我以前看到的女生的樣子完全不同。後來就有學姊問我想不想喝啤酒？我很興奮地說好。總之整個玩樂結束後，我回到家裡，覺得真是解放，不用像以前一樣當一個乖乖的女學生」。

J 表示雖然高中讀的是女校，但是從來不知道有同性戀這回事，大學進入女研社之後，才發現「原來女人跟女人之間可以相處得這麼好」，完全顛覆了她原本根深蒂固的異性戀想法，也顛覆了女人「需要男人」這個想法。K 也說，過去完全沒有同性戀的資訊，進入女研社之後，「活生生的人就出現在妳面前」，給她很大的震撼。接著因為很喜歡跟社團的學姊們在一起，就開始想同性戀的可能性。讀到女性主義的文章，說女人要愛女人，剛好學校舉辦很多同志活動，受到這些文化的衝擊和洗禮，她就下了一個重大的決定：「我可以去喜歡女生，把興趣投向女人，而且是很認真、很慎重的」。後來讀到分離主義女性主義理論的時候，更是完全為這種說法所吸引，決定要做一個「很純粹的分離國度的女人」。然後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跟男生接觸，後來也交了女朋友。這個時候，她去參加一個女性主義讀書小組，反而很受到異性戀女性主義的打擊。她覺得這些女性主義者想去瞭解男人的動機，遠高於想去瞭解女女相戀的動機，甚至不願意拿一本「女朋友」（註 2）來閱讀。

四、重要的性別斷裂事件：戳破賢妻良母與男強女弱的神話

誠如上節所言，從受訪者的敘述中，可以發覺共通的二個相互關連的價值觀在女性身上作用，一個是外在培養賢妻良母的教養，一個是內在男強女弱的意識形態。除了女性主義論述帶給受訪者衝擊與自省之外，生命中重要性別斷裂 (breakdown) 事件導致個人的遭遇與其由基模 (schema) 所引導的預期無法契合，因此當事人必須要重新修正或建構新的基模 (Agar, 1986, 頁 21)。對應到上述外在與內在的二個過程，受訪者提到生命經驗的斷裂與破滅，可以打破賢妻良母的迷思；而在事件中發現其實自己（女人）是很有力量的，則可以打破男強女弱的迷思。受訪者 A 與 I 都是已婚婦女，依著社會的預期走進婚姻、養兒育女，然後分別因為先生外遇以及先生的肢體暴力而歷經生命中的斷裂經驗，摧毀原來篤信的性別價值信仰。受訪者 A 從小在家裡與學校得到的訊息就是「女孩子要賢淑，要會做

家事就夠了」、「女人最好的歸宿就是結婚，嫁一個好先生」，所以她「從小就是準備唸完書以後結婚，當賢妻良母」。先生雖然是她的同班同學，該開始還算平等，但是慢慢地她就自然到了那個照顧家的女人角色中。連先生出去應酬晚歸，她都還一直認為「我應該要很賢慧...讓他無後顧之憂，所以孩子生病、教育，都是我在解決」。但是結婚二十幾年後，先生有外遇，婆婆給她的訊息是要忍耐，她也覺得「賢妻良母就是要把這個家醜給解決，所以我出面去解決的」。她以為「危機就是轉機」，說不定會因為這件事讓二人的關係變得更好，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可是她的先生絲毫沒有悔意，也不想跟她談；再加上婆婆告訴她：「男人玩不動就會回來」，於是她開始質疑女人是不是就應該這樣逆來順受。後來晚晴協會的工作坊給她很大的幫助。透過心理劇，她「把心中的髒水都倒出來了」，人頓時變得很輕鬆。以前她把生命中的各種遭遇歸因於自己的問題，或者是遇人不淑、運氣不好之類的，後來才知道原來與教育、家庭、文化結構都有關係，並不是她自己的錯。離婚之後，把媽媽、太太、媳婦這些角色都頓時抽掉之後，心靈頓覺空掉了，但是也因此開始找尋自己、發現自己，能量才慢慢出來。她學到了女人應該獨立、活得精彩；而且要先愛自己，然後才有能力愛人。

受訪者 I 在生完第二個小孩之後，辭掉原有的工作。有一天晚上她到廣播電台參加一個錄音節目，錄音到很晚，她自己心中也忐忑不安，可是因為是群體工作，她還是硬著頭皮把它做完。回到家裡已經半夜，她「記得是十二點五分...可能自己急，我摸不到鑰匙，所以我按電鈴」。按電鈴自然吵到她睡夢中的先生。她回家之後見著先生說：「怎麼按了那麼久，才開門」？沒想到她先生口氣很不好地回她：「我難道一定要幫妳開門嗎？為甚麼做到那麼晚？自己不會帶鑰匙」？她向先生解釋為甚麼會做到這麼晚，她先生就「啪啪啪，這樣一直打下去」。對她而言，「真的是晴天霹靂」，她覺得「從來沒有受過這種羞辱」。

受訪者 A 和 I 都是遵循社會的性別規範，走入婚姻，扮演賢妻良母的角色，但是先生外遇、先生打人的事件，打破了賢妻良母的迷思。她們深刻體會原來努力做好賢妻良母，未必會帶給女人幸福。因此開始反省婚姻的本質、開始發現自己。

有些受訪者則是在意外的事件中，發現自己的力量，因此打破男強女弱的迷思。受訪者 M 表示，從小生活中有各種選舉的時候，通常第一個會想到男生，總

是認為男生比較能夠管理別人、比較能夠承受壓力。後來她所參加的大學社團快要倒社了，沒有人要做社長，她就不小心被拱上去。因為社長要分配工作，所以她必須觀察社員的個性、是否可靠、是否負責任。結果發現社團女生比男生可靠，而且男女的做事能力其實差不多。此外，社長又必須以身作則，找別人做的事情自己也一定要會做，開始時是有些抗拒、不太平衡與掙扎，可是也慢慢藉機訓練自己的能力。在這個過程當中，她就不斷回想過去的成長經驗，過去為甚麼總是認為男生比較厲害、比較穩，男生成為言論領袖，而女生卻表現的比較閉塞、不太講話，她現在體會到男生的領導魅力並非天生，其實只是女人缺少訓練的機會罷了。

一位女性朋友 W 與其先生到遊樂場，一起玩拳擊的遊戲。就是用力的揮出一拳，機器上就會顯現此拳力道的磅數。她驚訝地發現，她先生和她的磅數居然數值相同，她第一次親身感受到自己身體的爆發力量。心想，女人如果在關鍵危急的時刻，其實力量不見得會輸給男人。那個時候，她的公公會對她婆婆施暴，她開始有了敢於對付她公公的自信。K 和社團同學爬山的時候，才驚訝地發現她自己原來比男生強太多，而且發現男生很不細心、很粗魯。前面曾經提及閱讀小紅帽手冊讓她成功反擊性騷擾，以及參加女研社帶給她在性別思考的衝擊。爬山的實例則一方面讓她看到自己（女人）的能力，並且同時反思男性特質與女性特質之間差異的意義。重新思考為甚麼過去總覺得好的特質都在男孩的身上，而女性只能扮演模仿者的角色，然而模仿永遠都比不上真正的男人，因此得以重新界定、肯定女性特質的價值。

總結而言，在我們社會性別教化的環境中，把好的特質歸給男人，劣等的特質歸給女人，讓女人注定扮演欣賞、模仿男人的角色。上述受訪者的性別意識成長經歷過三個階段或面向。首先是在具體的情境中，發現女人就算是在某些方面不如男人，但是女人並非「天生」不如男人，只是訓練不足罷了。第二是在許多親身經驗中，體會女人不見得比男人弱。亦即就算是採用男性的價值標準，女性未必輸給男性，甚至可能勝過男性。最後女人開始重新去界定、並且欣賞女性特質的價值，亦即挑戰父權的價值標準，重新界定甚麼是好的價值。這種重新肯定自己（女人）價值的過程，與婦女運動、重寫女性歷史的過程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五、有了性別意識之後：理論與實踐的拉扯

有了性別意識之後，受訪者一再提到的是女性主義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密切關係。女性主義不像其他的學術理論可以與日常生活分離。就像受訪者 E 所言，過去她認為「一個理論如果不能實行的話，不是這個理論有問題，就是妳有問題」，可是因為她信仰女性主義、認為女性主義是對的，所以就一直覺得自己有問題。

性別意識破除了賢妻良母的迷思，受訪者因此認為不應該一味地犧牲自己去滿足與迎合他人，她們也體會到「好女人的下場都蠻慘的」（A），而且「人要先愛自己才會有能力愛人」，女人應該要有勇氣「去做妳想的事情」（H）。又由於破除男強女弱的迷思，因此不再認為女人「不要太出風頭」。整體而言，受訪者大都表示對自我意象有較為正面的看法，對自己更有信心，同時更敢於說出自己的看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因此人變得更自由，世界變得更為開朗。

性別意識雖然會帶來自由與快樂，但是在一個父權社會中已經學習累積的價值與行為有時很難在一夕之間改變，於是會造成生活上的衝突與張力。像是受訪者 E 提及，當年她在參加女性讀書會的時候，對於要不要化妝，都要爭執好久。希望自己美麗一點，可是又很怕這樣會是取悅男人、服務父權。後來繼續研讀女性主義，覺得女性主義就是要女人擺脫束縛追求自主，如果連化妝、穿衣服這種事情都還要感到困擾，那怎麼會過得快樂呢？漸漸地，才能夠不再為這種事情煩心。C 則說：「我很喜歡王菲『我願意』這首歌，可是那唱起來，又一副小女人的樣子」。這不只是她內心的焦慮而已，而且是一個很實際的問題。因為當周遭男性知道她是女性主義者之後，就會借用各種機會來質疑她。E 則因為上了性別課程之後，過去很多「不舒服的那些東西都得到解釋」，可是像是婚姻、家務分工等問題卻沒有辦法在現實裡面得到解決，「所以會變得更痛苦」。

女性主義之所以有別於大多數學術理論就在於它的無所不在，每個人從早到晚的生活都無法迴避性別的議題。尤其是男女之間的親密關係，更是性別權力與感情的實踐戰場。根據受訪者陳述，性別意識展現在親密關係上的表現有，追求情慾自主、去除處女情節、探索一夜情，與主動追求愛情。但另一方面，又會覺得好男人愈來愈難找，或者發現不需要男人、不想進入婚姻生活，或者得到女人愛女人的可能性。由於社會中的男人在性別意識與行動上並沒有相對的改變，因此有可能因為彼此性別價值的日行漸遠，而由男方或女方主動提出分手。

受訪者 E 說：「要當一個獨立自主的女人，首先是要改變感情裡面的兩性關係；我覺得最關鍵的，就是女人不能坐在那裡等，要自己去追求愛情」。而在打破處女情節之後，M 也認為如果沒有男朋友，「為甚麼不可以跟別人在沒有愛的情況下去做愛？為什麼做愛不可以像吃飯喝茶一樣？我需要我就去做啊」。M 接著說，以前她或許不敢告訴別人她已經不是處女，但是現在覺得說也無妨。她甚至告訴她男朋友過去曾經跟一些男人發生一夜情的事實。她告訴男友「我現在所有的東西都是奠基於過去」，認為如果沒有過去那些經驗，她今天就不是這樣的人，也就不會跟現在的男朋友在一起。另一方面，她也主動引誘男朋友與她發生性關係，這樣結婚的時候，就沒有所謂誰是不是處女/處男的問題了。

像 M 在情慾經驗走得這麼激進的畢竟是極少數，然而能夠打破賢妻良母的迷思之後，婚姻有可能就遭到質疑。F 說她很排斥婚姻，因為社會裡普存的婚姻關係中，如果還是預設賢妻良母的形象，她覺得自己很難與現實對抗，而「如果你沒有婚姻的話，很多事情你不需要去面對和處理...可是一旦你進入婚姻後，逢年過節時，你要到誰家過節？那種很現實的問題都會跑出來」。而且婚姻不是二個人的事情而已，還牽涉婚姻雙方的家長/家族，然而自己改變容易，要改變老一輩的性別價值顯然困難許多。質疑婚姻必要性的另外一個原因則是看到「原來女人跟女人之間可以相處這麼好」。J 在進入女研社之後，對於「需要男人」這個觀念起了很大的顛覆。對於未婚的女性受訪者而言，最共通的體會就是社會中「好男人實在很少」。當女性有了性別意識之後，變得敢於表達自己的意見，追求自主與自由，而社會中的男人卻仍然沒有接觸女性主義，還在擁抱傳統的男性價值觀，對於無法掌握的女友，就會「受不了」（J）。J 的男友明確告訴她：「你愈接近女性主義，就跟我距離愈遠」！而 C 則說當人家知道你是女性主義者之後，就已經有一半的男人不會來找你了。結果很可能發生的是，男友因為無法接受強勢自主的女友而提出分手，或者女性受不了男友父權的想法而提出分手。受訪者 J 與 K，則選擇當女同志，然而 J 覺得對男生感到不屑，把男生從生命中刪掉之後，人生變得異常開朗；而 K 則發現女生與女生在一起，仍然可能存在不平等的關係。

已婚的 H 在婦女團體擔任義工，因為接線的關係，接觸更多家庭暴力的事件，因而更加珍惜自己的婚姻。I 因為夜歸遭先生毆打，覺得人格受到壓抑與羞辱，從此與先生關係冷淡，等小孩子長大能夠照顧自己之後，就準備離婚。然而不論是

更珍惜現有的婚姻，或是對於婚姻絕望，她們共通的經驗是會在親密關係中找尋能夠作自己的出口。她們學著分配家事、給自己自由時間、讓出門成爲一種家人能夠接受的習慣、以工作成就獲取先生的信任。

有了性別意識之後，對於朋友關係又造成怎樣的改變？不約而同地，有好幾位受訪者使用打仗、戰場作爲比喻。原因是一旦有了性別意識之後，一方面別人會用更嚴格的性別標準來質疑這些女性受訪者的平日生活言行是否合乎女性主義，一方面受訪者會自我要求，也會更看不慣生活周遭中性別歧視的言語行爲。於是性別觀念之爭，成爲「每日無不在進行的戰爭」（C）。

有了性別意識之後，在日常生活當中出現與性別有關的事情時要如何處理，受訪者認爲會視對方是否有誠意、有沒有改變的潛力與可能、是否想改變對方而定，而採取的策略經常是迴避、轉移話題、有技巧的說/表達看法，以維繫原有的關係。受訪者 B 覺得對方如果有誠意的話，她就會讓對方把話講完，盡量不要與他發生衝突；可是如果對方真的太沒有 sense 的話，她就會選擇性的罵人。H 認爲男人應該要自己去學習與體會，「沒有必要去教他」；J 則說「女人要喚醒女人已經夠難了，還要去喚醒男人，那真的是太累了」。

多數的受訪者都認爲性別在當今社會中仍然是一個極爲敏感的話題，稍一不慎，大家就會動了火氣。像 C 所說的，

男生很喜歡講黃色笑話，面對這些朋友，妳又不能切斷。我常常覺得很麻煩，妳面對一些女性同儕，也會覺得她們的性別意識怎麼會是那個樣子？可是妳又很難用妳的標準去衡量她們！因為那些標準，對她們來講，是太激烈的東西。那妳要怎麼樣能讓她們覺得她們的想法也被尊重的同時，又能告訴她們一些自己的想法。

C 表示「每次我們聊甚麼事情，我就會跟他說，你怎麼可以這樣想女生？其實我也沒有說甚麼重話，他就說，他被訓話了」。有了這些衝突或不歡而散的經驗之後，與男性同事友人相處的時候，她們大都選擇「會表達我的想法，但是我不會跟他辯」（如 H），或者用說笑話的方式（H），或者用更有手段、更爲迂迴、委婉的說話方式（E），以免引起衝突，破壞了當場的氣氛或影響彼此之間的友誼。F 說：「譬如對我們那個很豬的同學，我們雙方都很知道在這點上對方的態度是怎樣，可是雙方都不會去惹毛對方」。L 則是「用一種經驗分享的方式去

跟別人談，而不會以一個女性主義者的身份去教導別人」。F 則覺得自己的個性不會像很多女性主義者會「傳教」去改變身邊的人。

有了性別意識，當然可能就有了更多的使命感，看不慣社會中的性別歧視現象，而想企圖介入改變。像受訪者 C 所言，看到電視上播放一個具有性別歧視的卡通也會感到緊張，深怕周圍的人受到污染，於是在當下就想講些甚麼。受訪者 F 參加畢業旅行的時候，同學提議要烤肉，於是要進行工作分組。她知道按照慣例分組（每一組有男有女）以後，結果每一組內一定是「男生他們生完火就沒事了，那女生就會很辛苦的烤很久」，於是她主動建議按寢室分組，這樣男生就不得不做所有的工作。

絕大多數受訪者表示最難改變的是家人，認為對抗家中的父權非常辛苦。朋友可以維持表面關係，可以離開，愛人也可以分手，家人卻沒有選擇的機會。有趣的是，不住在原生家庭的人，認為既然沒有住在一起就沒有條件去改變（G）；而住在家裡的受訪者卻說，因為生活太近了，要避免衝突（B）。難以改變父母的一個原因是，父母可能是在一個沒有經過婦女運動洗禮的社會中長大，可能教育程度不高，不知道甚麼是女性主義。受訪者 K 說：「他們完全不知道我在講甚麼」，因此在她行動最激進的時候，也沒有想過去影響她家人的性別價值觀。J 在外面參加婦女運動的時候，回家也是不提隻字片語。

抗爭的結果很可能還是沒有撼動家中的父權，結果受害的還是女性，包括媽媽和自己。F 認為拋出一句話容易，可是最後受苦的很可能還是自己的媽媽。E 舉了一個非常生動的實例。她說有一段很長的時間，「都在猶疑到底要不要去洗碗？這種事情會很掙扎，比要不要上街頭，還掙扎」。E 表示洗碗是一件很現實的問題，「不洗的話，是我媽媽洗；我去洗的話，我又很不甘心」。她很生氣為甚麼家中的爸爸和哥哥吃完飯，可以就坐在一旁吃水果，但是她又無力影響家中的男人。雖然講過很多次「這好像很不公平」，但是在家中並沒有引起甚麼迴響。經過很長一段時間不洗碗之後，她還是屈服了，她說「至少讓我媽媽不那麼辛苦啊」。

可是同樣是女性的媽媽，也不見得與受訪者站在同一陣線成為盟友。媽媽在夫妻關係中是被壓迫者，可是卻又可能與先生聯合起來一起壓迫小孩。J 表示她不可能跟媽媽說，她爸爸為甚麼吃完飯可以不洗碗，就坐在旁邊，因為這樣會變成

父母親聯合起來一起罵她。她認為除非是「社會風氣改變...否則會犧牲得看不見屍首」。於是她們經常採取由遠而近的策略，誠如 J 所說：「有些東西你是對報紙說，然後報紙對家庭說，這樣反而比較有用」。婦女運動的策略也有「易子而教」、「易夫而教」的說法。傳統的男人如果自認為一家之主，就會更不願意接受家中女性的看法，而且家庭中充滿了情感/權力/利益的糾葛，要鬆動或改變關係更加困難。

根據受訪者的陳述，如果是對於父母或先生，大都表示難以改變，因此採用由遠而近的戰術。但是已經有兒女的受訪者則都會設法用有別於傳統的教養小孩方式。最明顯的就是家事分工的改變，他們常常採用的方式是，將家中所有的家務工作列表，請小孩在其中認領，然後自己再做其中沒有人喜歡做的家事（G）。有的在追求自我的同時，也剛好可以「放個空間給孩子」（I）；有的會刻意教導新的性別觀念，例如顛覆性別的「青蛙王子續集」的故事（H）；教導男孩子要尊重異性（H）；傳達打架是暴力犯罪的觀念，因此自己也用講理而非打罵的教育方式來以身作則（H）。

五、結語

性別意識指的是對於性別的認定、對性別結構的不滿，並寄望集體行動來改善女性的社會處境。它是一個連續的過程，受訪者不必然有自覺的受到性別壓迫/歧視的主體經驗，意識也無法僅由內省就可以獲得，而論述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意識形成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儘管其間有些具有指標意義的事件發生，但是很少是為單一事件所決定。

每個受訪者的意識形成歷程並不完全相同，相反地各自殊異，然而在過程中大抵牽涉本論文中所探討的成長性別經驗、接觸論述、參加團體、遇見典範、遭逢性別斷裂經驗、理論與實踐的衝突等面向。茲以受訪者 B 為例，敘述一個緩慢、連續的形成歷程。B 是四年後段班，家中有好幾個姊妹。由於是外省人，家中沒有長輩，生活特別自由。讀書過程非常順利，因此她自認是聰明的人，從小不會用性別來對人加以分類。當學生的時候，就乖乖唸書。在可以接受女性主義啓發的大學年代（民國 60 年代後期）卻因當時台灣還沒有婦女運動團體，以致沒有機

會與人討論，否則會更早發現自己。但是大學時，有次下課站在老師研究室門口，遭經過的男同學吹口哨，她非常生氣對著他說：「你以為我是狗啊」，讓對方感到非常驚訝。她因為受到輕薄而生氣，也因此意識到自己是一個會被吹口哨的人，是一個女人。到國外留學之後，跟一群男同學一起讀進步的書籍（社會改革、左派、反專業論述），還沒有性別概念。後來修習一門社會課程，課堂中播放女性主義紀錄片（如女工紀實），讓她異常感動。民國 76 年回台灣的時候，正好碰上華西街救援雛妓的遊行，本來是基於好奇去拍照，但過程中看到參與者又哭、又喊、又唱歌，這種一起站在街頭的氣氛讓她備受感動，也開始認同救援雛妓的行動。後來與一群女人組成讀書會，才慢慢把她自己過去成長的點點滴滴做為女人的經驗串接起來。她說觀看女工紀錄片、參與救援雛妓遊行，對她而言都還只停留在感動的層次，沒有延續；但是在讀書小組中，聽別人的故事、參與討論，才真正有性別知識的累積。因此也開始撰寫性別論述，寫影評投稿，進而加入婦女團體成為積極的運動者。

由於本研究採取生命史的訪談方式，並沒有長期追蹤觀察受訪者成長的過程，事後回溯的敘述難免會採取一種比較是直線進行的敘事結構。對於過去的敘說與詮釋難免是建基於敘說當時的生命處境。再者，訪談當時受訪者還處在積極參與性別論述或行動的時刻，因此會從這樣的基點來詮釋其生命經驗。訪員只能在訪談進行過程中，儘量讓受訪者能夠說出複雜而多樣的經驗，說明事件發展的前因後果，敘述成長過程中所遭遇的矛盾與衝突。根據訪談資料，性別意識形成過程也絕非是一個簡單的從低到高、從看不見到看見真實的、有一個預設終點的線性階段過程。許多受訪者歷經懷疑（我有資格當女性主義者嗎？我該不該化妝？我可以撒嬌嗎？為甚麼我已經有了性別意識，夜晚還是不敢獨自一人在家中睡覺，希望有男人保護？）、遭受挑戰（如果連妳弟弟都改變不了，妳還算是女性主義者嗎？為甚麼妳總是給我扣帽子？）、挫折（本來無話不談的好友，現在為甚麼形同陌路？）、沮喪（男友無法接受我可以獨立自主的過活，而要與我分手。），甚至痛苦（不能對抗體制，又感到不滿，不曉得自己該怎麼辦？）的過程。因此，有沒有進一步論述補給、姊妹情誼的支持、大社會性別價值的改變等，都會影響特定個人性別意識形成歷程的進行方向。

性別意識形成無法脫離當時的社會（婦女運動與論述）脈絡，根據受訪資料，

二三十歲的年輕受訪者大都是在就讀大學時從課堂、讀書小組、女研社得到女性主義的滋養，有的甚至在高中的時候就接觸女性主義。然而四十歲以上的已婚受訪者則比較是從婚姻關係中的挫折開始反思性別議題，進而參與讀書會或婦女團體。誠如受訪者 B 所言，由於就讀大學時台灣還沒有婦女團體，否則會更早受到女性主義的啟發，看到性別關係中的自己。

女性和男性（畢恆達，2003）的性別意識形成歷程會有和不同呢？首先，無論在怎樣開明自由的環境中成長，女性處在一個歧視女性的社會，就必然會經歷性別歧視（貶抑、性騷擾、婚姻等）的事件，自身因為是女性而受歧視與壓迫經驗就形成性別意識的基礎。男性主觀上也可能有因性別而發展受限制的經驗，然而有些男性則是因為看到身邊或社會中的女性受壓迫，以及基於社會公平正義而接觸女性主義。有了性別意識之後，女性非常關心理論與實踐的關係，覺得處處是戰場。自己懂得追求自由，但也帶來痛苦與掙扎（該不該化妝？能不能依賴男人？）；看到性別不公的言論或事件，想要干預，又不想傷朋友感情；難以挑戰家人，又可能帶給自己更大的負擔（如家務勞動）。相對而言，男性比較沒有那麼深刻地將女性主義論述與自己每日生活實踐連結。

女性提到接觸女性主義論述的時候，經常伴隨著參加團體以及遇見不同的女性典範。團體讓她有了持續參與性別平等的動力，得到知識與情感的支持；而女性典範則給她帶來生命中不同的可能性。男性則比較常提到性別論述對他的啟發；由於台灣並沒有具有女性主義意識的男性團體，男性的女性主義者也屈指可數，因此也沒有人提到團體與男性典範對他的影響。此外，女性在形成性別意識的過程中，歷經賢妻良母意識形態以及男強女弱價值觀的破滅與重思，然而男性要成為女性主義者卻是要真誠面對自己的內在強暴犯(the rapist within)(出自 Pease, 2000, 頁 43)以及不勞而獲的特權(earned privilege)(出自 Schacht, 2001, 頁 203)。

註 1：資料來自於小學生的作文。我請男學生寫「假如我是女生」，女學生寫「假如我是男生」。

註 2：「女朋友」是台灣一本很重要的女同志刊物。



參考書目

- Agar, M. H. (1986). *Speaking of ethnography*. Beverly Hills, CA: Sage.
- Downing, N. E., & Roush, K. L. (1985). From passive acceptance to active commitment: A model of feminist identity development for women. *Th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13*(4), 695-709.
- Gerson, J. M., & Peiss, K. (1985). Boundaries, negotiation, consciousness: Reconceptualizing gender relations. *Social Problems, 32*(4), 317-331.
- Griffin, C. (1989). 'I'm not a women's libber, but...': Feminism, consciousness and identity. In S. Skevington & D. Baker (Eds.), *The social identity of women* (pp. 173-193). London: Sage.
- Gurin, P., & Townsend, A. (1986). Properties of gender identity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gender consciousnes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5*, 139-148.
- Hyde, J. S. (2002). Feminist identity development: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Th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30*(1), 105-110.
- Pease, B. (2000). *Recreating men: Postmodern masculinity politic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Schacht, S. P. (2001). Teaching about being an oppressor. *Men and Masculinities, 4*(2), 201-108.
- Stanley, L., & Wise, S. (1993). *Breaking out again: Feminist ontology and epistemology* (new ed.). New York: Routledge.
- Wilcox, C. (1997). Racial and gender consciousness among African-American women: Sources and consequences. *Women and Politics, 17*(1), 73-94.
- 朱嘉琦 (1996) 《台灣婦女女性意識發展歷程之研究—以三位女性主義者的生命故事為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學系碩士論文。
- 吳書昀 (2002) 《性別意識的發展歷程：以婦運參與者為例之研究》。高雄師範

- 大學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昱貞(2001)《性別平等教育的實踐：兩位國中女教師的性別意識與實踐經驗》。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 施悅欣(1998)《師生性別意識與教師教學立場--以性別相關課程為場域》。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高歆怡(2002)《女性成長社團學員的女性意識知覺及轉化歷程之研究—以台北縣永和社區大學為例》。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畢恆達(2003)〈男性性別意識之形成〉《應用心理研究》，第十七期，頁 51-84。
- 陳凱筑(2003)《國小女性教師性別意識構成與實踐之研究》。國立台中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曉玲(2001)《破繭而出：一位牧師娘性別意識覺醒、反思與信仰實踐的故事》。輔仁大學心理學系碩士論文。
- 黃燕萍(2000)《我是誰？：一個女準教師性別主體意識的啓蒙過程》。國立新竹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鄭漣姣(2000)《女性教學者女性意識轉化及其教學實踐之研究》。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本文實際出刊日為：2004年9月)



附錄：受訪者基本資料

受訪者代號	出生年代	訪談時之學歷	訪談時之工作
A	三年中班	學士	婦女團體
B	四年後段班	碩士	婦女團體
C	六年前段班	研究生	
D	六年前段班	學士	開店
E	五年後段班	碩士	記者
F	六年前段班	碩士	準備出國
G	四年前段班	專科畢業	家庭主婦/婦女團體義工
H	四年後段班	學士	家庭主婦/婦女團體義工
I	四年前段班	專科畢業	家庭主婦
J	六年中班	大學生	
K	六年中班	大學生	
L	六年前段班	研究生	
M	五年中班	大學畢業	家庭主婦
N	五年後段班	研究生	
O	五年後段班	研究生	

註：X 年代表民國 X 十年出生，前段班代表 0-3 年，中班代表 4-6 年，後段班代表 7-9 年。例如民國 58 年出生，就是五年後段班；民國 62 年出生，就是六年前段班。



The Formation of Women Gender Consciousness in Taiwan

Herng-Dar Bih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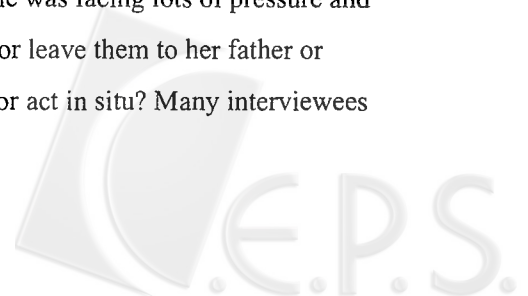
Abstract

Gender consciousness refers to the identification of gender, the discontent of gender structure, and the expectation of collective actions to improve the social condition of women. Fifteen women who participated in women's groups or women's studies were interviewed, aged from 20 to 50.

Gender consciousness is an ongoing process. Interviewees did not necessarily have the subjective experiences of being oppressed because of her gender. Nor could gender consciousness be acquired through inner reflection. Furthermore, feminist discours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Although, there were some critical events in the process, the consciousness was seldom determined by a single event.

Based on the narratives of interviewees, two interlocking values acting on them were found; one is "men are superior to women," the other is "being a good wife and a good mother." Feminist discourse was an important mediator to help them to break out the framing of traditional gender values. Some just happened to meet with the discourse; some were purposefully seeking for it. Without feminist discourse, women tended to attribute their uncomfortable experiences to personal ability or human nature. With feminist discourse, they could acquire new meanings of their past experiences and be empowered by feminist practice.

Being a woman with gender consciousness, she might have a new self-identity, be more confident to express herself. On the other hand, she was facing lots of pressure and struggle. For instance, should she wash dishes at home or leave them to her father or brothers? Should she correct her friend's sexist speech or act in situ? Many interviewees



indicated that it was most difficult thing to change their family members' gender values. Therefore, they adopted the strategy of "from far to near" which means they would try to educate their friends or society and then the outside people would educate their family members, especially their father or brothers. They also tried hard to intervene in discriminatory incidents without endangering their relationship.

